

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政治

以《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為例

林宇玲（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本研究採用 Lois McNay 的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場域的關係作為理論架構，檢視以公共為導向的《小世界》新聞室之性別政治，同時探討學生如何在此協商其性別認同和專業實踐。

研究有四項發現：首先，在以女性為主的新聞室內，不會讓女記者感到女性特質是負面資本，但實際的新聞運作卻多強調人際關係，因而發生一些衝突和爭議。其次，《小世界》以女生居多，學生傾向以同班兼好友為選版依據，強化同儕關係在新聞實踐的影響力。第三，《小世界》雖然以公共為理念，但實際運作仍未脫離傳統的專業規範。學生為了上報，傾向接受並內化組織和專業規範的要求。最後，學生的性別化生存心態若不符合版面的專業屬性，在實習過程中須經歷較多的掙扎與協商。

關鍵詞：公共新聞學、性別與新聞學、性別化生存心態、新聞教育、新聞專業訓練、新聞場域

一、前言

新聞業過去被視為男性領域，但受到商業化和通俗化影響，有越來越多女性加入新聞業，新聞報導也逐漸在主題與風格上趨向軟性化，並出現「報業陰性化」(feminization of the press)或「新聞學陰性化」(feminization of journalism)的現象(Carter, Branston, and Allan, 1998; Gill, 2007)。

早期女性主義者曾認為，新聞業對「女性」報導不公，是因為組織裡陽盛陰衰所致；若能提高女性的參與人數，自然會有效改善女性的再現問題，同時也提升婦女在新聞業的地位與聲望(Ross, 2001)。

不過現有的研究卻發現，大量的女性接受新聞教育或加入新聞行列，並不足以改變現狀，因為她們所負責的是消費議題等缺乏時效性的軟性新聞，或家庭版之類的次要版面，加上有些女性仍須兼顧家務，因此比較難在強調「機動性」的新聞業嶄露頭角，晉升為主管(賴維真，2003；Lofgren-Nilsson, 2009)。而有些女性儘管成為資深編輯或報社主管，卻仍沿用原有的男性價值來判斷和報導新聞，導致新聞專業與新聞室的性別運作減少改善(林鶴玲，1998；Beam and DiCicco, 2008)。

由此觀之，新聞的再現問題，不是單憑多樣化新聞室(diversify newsroom)或平衡性別比例就能解決，還必須反省男性化的新聞專業意理，如何打著去性別化的「中立」旗幟逃避眾人檢視，鑲嵌在主

致謝辭：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政治：以「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為例〉(NSC 99-2410-H-128-028)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除感謝所有參與的研究助理外，也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與編委會的協助。

流媒體的新聞產製過程中，並透過新聞室的社會化影響工作者的表現。

Jane Rhodes (2001) 指出，新聞專業的社會化其實不只發生在主流媒體的新聞室中，甚至早在記者接受新聞教育時就已經開始。然而，這部分過去並未受到重視，所以我們也不清楚新聞教育究竟是性別偏見的共犯結構——試圖以「客觀中立」之名，為新聞產業培訓未來的新聞工作者；抑或能具遠見地協助學生辨識並挑戰性別認同與新聞專業之間的衝突與利害。

男／女學生在接受新聞教育和職業訓練之前，便已深受性別社會化影響。因此，新聞教育如果未先批判「性／別特質」的社會安排和文化想像，就逕自以「中性」的專業規範和技術來要求、培訓學生，將會讓他們不假思索地以主流方式（即性別化的思維與中性的專業表現）來從事新聞實踐和性別建構。這樣的職前學習與訓練，也將被帶入日後的職場中，強化個人的專業經驗。由此觀之，新聞教育在整個新聞專業化的過程中，實扮演著重要角色。

近年來，新聞教育面對主流媒體的商業化和新聞品質惡化，除了批判客觀的專業意理外，也開始對以技術為主的新聞課程進行反思。David Nolan (2008) 指出，大學新聞課程其實是一種以產業為導向的職業課程（an industry-oriented vocational curricula），著重在技巧訓練和專業價值，為新聞產業培訓未來的人才。這樣的專業訓練已讓新聞媒體與工作者變得更加保守且缺乏反思力。Barbara Kelley (2007) 因此呼籲新聞教育不該淪為職業訓練，而應發展出一套具有反思和反身性（reflective and reflexive）的課程，協助學生以批判方式來思考其專業和實務表現。

為了提高新聞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Jennifer Rauch 等人

(2003) 建議在課程設計上，應採用以「社群／社區」為導向的公共新聞學來從事改革，藉此讓學生重新審視新聞專業的意涵、新聞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新聞專業與社群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傳統的專業要求，公共新聞學不再強調新聞記者的中立角色和超然態度，而鼓勵他們涉入社群／社區活動，與居民一同發現並解決問題 (McDevitt, Gassaway, and Perez, 2002; Rauch, Trager, and Kim, 2003)。顯然，公共新聞學已放棄追求中立與客觀性。但這種未考量性別運作，僅以「公共」為旨趣的新聞教育，是否有助於破除傳統新聞學在專業判斷和新聞實務上的性別偏見，並協助學生創造友善、合作的新聞工作環境？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從 94 學年度起，開始進行以公共新聞學為導向的課程改革計畫，其實習報刊《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簡稱《小世界》) 也在 96 學年度配合課程改革，轉型為以公共新聞學為理念、社區關懷為旨趣的學生實習刊物，讓學生從事有別於主流的公共新聞實踐。《小世界》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檢視大學生進入以社區為主的新聞室中，其性別經驗如何影響新聞實踐和自我建構。

過去，國內在新聞和性別方面的研究，較少使用個案和民俗誌研究法，因而較少探討性別化的個人在專業化過程中，所採取的協商與應對策略。由於《小世界》是一個新聞專業的「實驗」場域，不但階層化程度較低，且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學生在《小世界》的活動，將有助於我們辨析社會的主流價值、個人的性別經驗、組織的專業理念、以及新聞的實務工作之間的複雜建構過程。

為此，本研究採用批判民俗誌，並挪用 Lois McNay 的「性別化生存心態」(gendered habitus) 與場域 (field) 之間的關係來檢視《小世界》新聞室的性別政治，探究以社區和公共新聞學為導向的新

聞運作，是否能協助學生意識其性別經驗與新聞實踐之間的關係，從而改善新聞室的性別運作與現有的報導方式。

二、理論架構與研究問題

(一) 性別與新聞室文化

有關新聞組織與性別的研究，早期多偏向調查組織的性別比例和職務安排，以說明女性在新聞室內所處的不利位置。Marjan de Bruin (2000) 指出，傳統研究只呈現組織的雇用模式，但未說明性別如何(被)建構在組織的日常運作中。因此她建議，相關研究必須超越數據，改探究性別特質如何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被具體化，且一再被工作者所維持。

de Bruin (2000) 也開始關切新聞室的性別政治，發現記者一旦進入新聞室，就必須持續與性別認同、組織認同及專業認同進行協商。新聞專業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強調競爭、公共性、客觀標準及超然立場，此與主流媒體的商業利益不謀而合，因而被嵌入組織的日常運作，導致新聞室傾向男性化，不利於女性發展。婦女為了追求所謂的「專業」表現，自然會認同組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會化 (a secondary 'male' socialization) (Gallego et al., 2004)，並誤以為新聞生產與性別無關。這也是為什麼當婦女成為資深編輯後，仍做出與男性一樣的新聞判斷 (Lavie and Lehman-Wilzig, 2005)。

儘管新聞組織多自稱性別中立 (gender neutral)，但性別其實已被併入組織的運作，而出現性別隔離 (gender segregation) 和性別階層化的現象。前者指新聞工作仍採用性別分類 (gender-typing)，依

性別角色區分男／女性的勞動參與，例如在路線安排上，男性負責硬性新聞，女性則做軟性新聞。後者是受性別迷思影響，認為女性無法勝任主管職務，加上有家庭牽絆，對工作較不投入，所以女性不易升遷（Lofgren-Nilsson, 2009; Robinson, 2008）。

女性除了在勞務分配上容易遇到職業隔離與低薪待遇，在人際互動上也須忍受男性對其外貌的指指點點或性騷擾（賴維真，2003；蕭蘋，2004）。儘管婦女在新聞產業的勞動條件並不理想，但她們也不是全然逆來順受，而會發展出各種應對策略，至少有三種（Djerf-Pierre, 2005, 2007; North, 2004）：

1. 採用競爭策略：婦女拒絕其女性特質，以「男性特質」為專業的象徵，並採取男性的行事風格，努力累積專業資本。
2. 善用女性特質：婦女肯定自身的女性特質，認為細心、敏銳或善於溝通讓她們更適合從事新聞工作，或易擴展消費、環保議題等新的報導類型。
3. 出現女性主義的反應：受到性別平權影響，有些婦女發展出性別意識，主動反抗宰制的男性觀點，並致力於呈現另類聲音與意義。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目前有關性別化的新聞組織研究，已探討婦女的雇用狀況（如數量與職務）、勞動條件，以及新聞室的男性文化（如男性決策或性騷擾）等問題，但 Rhodes（2001: 51-52）認為，我們仍須從女性主義的觀點進一步檢視新聞專業，尤其應擺脫過去的性別極化模式，探討男／女性在新聞室內究竟如何取得主體位置，並與組織的例行事務與新聞慣例進行協商，以尋求改變的可能。

（二）非主流的新聞室運作

現有的性別與新聞研究多針對主流商業媒體，發現女性加入新聞業仍無法改變現狀，因為陽性化的專業意理已被併入新聞產製過程，不利於婦女發展。

事實上，女性主義對新聞專業意理的抨擊一直不遺餘力：不僅質疑其以「客觀」為「中立」，只著重表象的精確、平衡及公正，而忽略事件背後的成因與脈絡，亦指出其無視於小人物的情感與經驗，導致婦女和少數團體的聲音被邊緣化（Allan, 1998）。近年來，由於新聞品質日漸惡化，新聞學界也開始對客觀意理進行批判，並提出以社區／社群為導向的公共新聞學來改善新聞問題。

在美國，公共新聞學被視為新聞業的內部改革運動，即面對報業無法善盡「公共服務」之責而做出的變革——實驗性地開闢一個版面或專題，探討社區公民關注的問題，並以公共審議的方式提出解決方案，藉此促使公眾參與民主過程（Ahva, 2012; Nichols et al., 2006）。美國目前已有超過 650 項的公共新聞學計畫，大致可分成三類（Haas, 2003, 2007）：一是（選舉期間）擴大競選報導範圍，如以問卷方式大規模調查地方居民關切的議題，再邀請候選人來回應；二是針對特定社會問題（如貧窮、種族歧視），以焦點團體或公民論壇的方式進行公民審議，並提出解決方案；三是將公共新聞實踐併入新聞組織的常規，即要求記者關心地方議題，聽取民眾意見，並邀請民眾一起參與新聞的產製（Ross, 2007: 451-452）。相關的研究亦發現，從事公民新聞實踐的媒體在選用消息來源上，的確反映出一般公民、婦女及弱勢族群的聲音（Haas, 2007; Haas and Steiner, 2006; Kurpius, 2002; Massey, 1998）。

由於公共新聞學旨在促進媒體、社區與民眾之間的對話，因此新聞記者不再是超然的旁觀者——只報導事實或陳述問題，而成為積極的參與者或鼓吹者，能主動涉入社區，鼓勵民眾參與，並協助其發現及解決問題（Rauch, Trager, and Kim, 2003; Woodstock, 2002）。Theodore L. Glasser（1999）因此認為，公共新聞學將有助於改變新聞實踐和新聞室文化。

現有的計畫顯示，越來越多的地方報或社區報已採用公共新聞學取向，這是因為兩者都以社區為重（Haas, 2007）。不同於主流媒體，社區報具地緣性，強調地理上的社群參與和近用，一般被視為「非主流」媒體，因其規模小，僅能利用有限的人力和資源，報導被主流媒體忽視的地方人物，並以週報或雙週報的形式出版，服務地方讀者（Ali and Conrad, 2015: 6-7; Lowrey, Brozana, and Mackay, 2008: 276, 282）。一旦採用公共新聞學，社區報將不再只有「地方性」，更強調「參與性」，亦即協助地方居民成為公民，關心地方事務與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Lowrey, Brozana, and Mackay, 2008: 283-284）。

就此觀之，以公共為導向的社區報新聞室中，應該會出現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運作。女性在這樣的新聞環境中，是否不再感到女性特質是負面資本，而能發揮所長？目前尚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小世界》為例，檢視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化運作與新聞實踐的關聯。

（三）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

「性別化生存心態」是由 McNay 所提出，她挪用 Pierre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和「場域」概念，改從性別觀點重新檢視結構與能動

性之間的關係。

1. 性別化生存心態

Bourdieu (1977: 72) 以為，「生存心態」包含「被建造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 和「建造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前者是個人長久以來面對外在結構（如家庭的社經結構或階層化的性別關係）的刺激，經不斷調適後所內化的產物，因此生存心態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個人所處的社會條件。在性別的社會化過程中，個人從小便習得二元的性別分類，經過不斷體驗而掌握身為男／女人應有的稟性與行為舉止，並發展出「性別化生存心態」，建立男／女性特質 (Chambers, 2005; Wade, 2011)，例如女孩對藝文活動感興趣，男孩則偏好運動項目 (Devine-Eller, 2005; Dumais, 2002)。

「建造的結構」則指「被建造的結構」讓個人瞭解到成功／失敗、可能／不可能的機會結構，並形成認知與期望，使其在特定情境做出某種反應與行動。不過，行動並非預先被決定，而是充滿模糊與不確定性——亦即個人對場域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做出策略性的即興演出，此可能強化或修正「被建造的結構」。例如在男性宰制的新聞室內，有些婦女會選擇成為男性的一員，藉由隱藏女性特質，並以男性為前輩，加入硬性新聞的報導行列；有些則選擇成為女性的一員，運用女性特質負責副刊或軟性議題 (Lofgren-Nilsson, 2009)。

對 Bourdieu 來說，生存心態並非決定性的結構，而是生產原則。在場域內，生存心態雖能衍生無數的行為、思考及表達模式，但同時亦侷限其多樣性。儘管個人當下的實踐是自發的 (spontaneous)，卻超越現在的立即性 (immediacy) ——亦即動員了過去經驗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期，一併嵌入現在的客觀潛力狀

態 (a state of objective potentiality)，並體現在身上 (Bourdieu, 1992: 138)。易言之，實踐乃是生存心態的產物，同時包含結構的限制和個人的能動性。

McNay (1999) 認為，相較於階級，Bourdieu 較不重視「性別化生存心態」，雖然他也曾探討男性宰制的問題，但並未將它放入場域內分析，導致其性別概念過於僵化。Bourdieu (2001) 以為，性別差異是象徵暴力的效果，而男／女性特質在這過程中，被視為正／負面的象徵資本嵌進男／女身上，成為客觀的分類系統，並被知覺為理所當然。這種認知效果 (即 doxa) 讓原本武斷的社會差異自然化，進而鞏固社會上的性別分工，如男性主宰／女性附屬、公領域／私領域。

根據 Bourdieu 的說法，性別運作似乎牢不可破，但這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兩性發展。不過，McNay (1999) 也意識到，現今的性別關係即使某些部分 (如勞務分配) 可以被重構，但某些前反身性 (pre-reflexivity) 的面向 (如母性) 卻無法輕易被重塑，例如女性總是習慣為他人著想。這也被發現在新聞室內，像是女性經常扮演安慰同事之類的母性角色 (mothering roles)。

McNay (1999, 2000) 因此指出，Bourdieu 的生存心態的確讓我們注意到性別認同中根深柢固 (entrenched) 的一面，但必須從場域著手，才能瞭解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客觀結構內，不斷地協商其性別認同。

2. 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

生存心態直接關係到場域。場域是關係性的概念，被定義為「位置之間客觀關係的網絡或形構 (configuration)」，涉及位置的位階與

各種資本分配之間的關係 (Bourdieu, 1993: 72)。每一場域都有自主性，具有特別的內在邏輯，建立與其他場域之間的非同步且不均等關係。

場域內總是蘊藏著各種形式的資本與價值 (見表一)，性別化的個人會試圖奪取這些資本的控制權，以維護、改變或提升其地位，因此場域也是抗爭的場所 (McNay, 2000: 52)。雖然某些行動者擁有相似的生存心態，但因所處位置有別，便會產生不同的實踐與立場。顯然，場域讓生存心態有了動態性。

表一：資本的種類

象徵資本		
被制度化公認、和被合法化的權威以及稱謂，對文化、經濟、社會資本的交換與轉換是必要的		
文化資本	形體化的資本	稟性、語文實踐及身體生存心態的再現資源
	客體化的資本	物品、文本、物質客體及能傳送給別人的媒體
	制度化的資本	學院的資格、獎勵、專業證照與證件
經濟資本	物質物品和資源可直接轉換成金錢	
社會資本	近用文化、次文化制度、社會關係及實踐	

資料來源：Carrington and Luke (1997: 102)

Bourdieu (1992: 127) 指出，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存在著雙向模糊的關係。一方面是制約 (conditioning) 關係：場域形塑生存心態，生存心態成了某個場域的既有屬性，並體現在個人身上。另一方面是知識關係或認知建構 (cognitive construction) 的關係：生存心態賦予場域意義，使其充滿感覺和價值，讓個人覺得值得投入精力。

由此看來，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具有本體論上的一致性（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社會現實既在場域中，也在生存心態內；既在行動者之外，也在行動者之內。當行動者遇到契合其生存心態的場域時，會感到適得其所，並迅速掌握場域內的資本與利益（Bourdieu, 1992: 127-128）。以男記者為例，其生存心態符合主流新聞室的運作，因此比女性更易獲得專業認同並掌握資本和利益，同時也較少察覺組織內的性別歧視（Djerf-Pierre, 2007: 95-96）。

McNay（2000: 54）批評 Bourdieu 似乎只關心生存心態如何滿足場域的要求，而忽略兩者間的衝突與分裂（disjunction）可能造成生存心態的改變。由於每一場域各有其性別邏輯，性別關係未必以相同的方式一再被複製，因此當行動者跨越不同場域時，必然會先展開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e），試圖瞭解不同場域的規則、價值及資本間的運作，並依據所在位置挪用適當資本，從事或調整活動。就此而論，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的關係，有助於說明性別化身體的象徵過程如何連結至周遭的物質關係（McNay, 2000: 72）。藉由檢視兩者的關係，可以解釋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特定新聞場域內協商並實現其男／女性特質。

（四）研究問題

《小世界》的新聞室運作不同於主流商業媒體，其女性比例遠超過男性，再加上以公共新聞學為理念、社區關懷為旨趣，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性別和新聞專業操作。

在此數位化、非營利（由學校資助）的新聞場域內，男／女學生被允許自由選擇職務和新聞工作，這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檢視：男

／女學生如何受到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影響，主動選擇其位置並挪用資本與價值，從事新聞實踐和性別建構。

為掌握《小世界》新聞室的性別政治，本研究試圖探討下列問題：

1. 兩性如何認知《小世界》的公共定位？又如何與此新聞專業進行協商？
2. 兩性在新聞室內分別佔據什麼樣的位置？性別如何被嵌進新聞的生產過程？
3. 兩性在新聞室中各自擁有和累積哪些資本？性別化生存心態如何與其他面向交錯，影響其新聞實踐？
4. 兩性如何察覺新聞室的性別運作，並採用哪些抗爭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批判民俗誌

由於新聞實踐和性別認同皆是特定權力運作下的產物，因此本研究以《小世界》新聞室為研究的「場域」，並採用批判民俗誌進行調查。批判民俗誌不同於傳統民俗誌，不追求科學程序或客觀證據，而強調所有的調查或解釋都無可避免地只能提供主觀、局部和處境性的觀點（Lather, 1992）。作為一種方法學，它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旨在揭露並批判某一社群的壓抑處境，故偏重在調查場域內的權力運作、社會關係、物質條件、壓抑形式及反抗策略，以瞭解被壓迫者如何建構意義、經驗和認同（Thomas, 1993）。

在學校的新聞／教室場域裡，學生仍是較弱勢的一群，既無法

參與課程改革與規劃，對於改革方案也只能配合接受。因此，本研究從學生的角度切入，並關注性別層面。Patti Lather (1992: 91) 指出，女性主義者雖然主張性別在形塑意識、技巧、制度與權力分配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未否認階級、族群和性傾向也是有力的形塑勢力 (shaping forces)，因此她們也調查性別如何與其他勢力交錯，對個人處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就「生存心態」的概念來說，除男／女性特質外，階級、族群及性傾向也會影響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形塑，並干預個人對當下情境做出性別化、階級化、族群化的反應，所以在場域裡可以看到多元、異質的性別表現 (林宇玲, 2008: 183-184)。

為了說明壓抑形式和多元差異，批判民俗誌允許研究者根據其目的，採用多元方法，以瞭解個人如何受制於壓抑結構，同時發展協商策略。為此，本研究也根據研究旨趣，採用多元方法，包括參與觀察 (代號 PO)、半結構式問卷調查 (見附錄一) 和深入訪談 (代號 I)，進一步掌握學生的新聞實踐與性別文化之間的關聯。¹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99 學年度修習「小世界實習」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187 位 (63 男、124 女)；此屆學生是大學部第一批修過「公共新聞學」和「社區傳播」課程 (大二必修課) 的學生。不同於學長姐，他們是在瞭解公共／社區新聞學的情況下，進入《小世界》實習。來自三個班級的學生分成兩批，輪流在上、下學期至《小世界》實習。

1 進行資料分析時，若引用參與觀察資料，文中將標示 PO 與日期，如 PO-2010/11/2；若是深入訪談，則為 I-2010/11/2。

《小世界》配合新聞系的課程改革，從 96 學年度重新定位為以公共新聞學為理念、社區關懷為導向的實習刊物，並改版成《大文山區社區報》，報導範圍擴大為文山區和新店區。每期共有八個版面：頭版為當週要聞，從其他版面擇取重要新聞；二、三版屬於公共議題，如公共建設、交通、市政、醫療、教育等；四版為社區議題，針對社區的公共議題進行專題討論；五版為世新大學的校園新聞；六、七版分別為文山和新店的軟性議題，包括社區人物、藝文、地方風情、溫馨關懷等故事；八版則是財經相關報導與分析，不同於其他版面，此版是和財務金融學系（財金系）合作。

所有學生在實習前，必須先選定職務（包括副／總編輯、發行組副／主任、編輯、召集人、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負責的版面，然後開始一學期 16 週（出刊 16 期）的新聞實踐。本研究以各版為單位，將學生依序編號，如 2₁M1 指第二版上學期（99-1）第一位（M 表男性）；6₂F11 則指第六版下學期（99-2）第 11 位（F 表女性）。²

研究者向《小世界》師生說明研究計畫並取得同意後，開始進行研究。每學期聘請 3 位大三學生為研究助理，她們不僅是實習記者，同時也負責研究的參與觀察（包含編前會、編後會和編輯室）、問卷填寫和訪談工作。研究者並未直接涉入《小世界》，不過大三學生在得知研究計畫後，經常主動分享跑新聞的各種經驗，讓研究者有機會以旁觀者身分查核資料的正確性，並深入瞭解學生的實習狀況。

2 每版第一位為召集人，其餘學生為記者或編輯。編輯一職以八期為單位，可與記者職務輪替。

四、研究分析和結果

(一) 學生對《小世界》公共走向的認知與協商

問卷分析顯示，七成學生認為《小世界》屬於公共新聞學的典範(paradigm)，但有二成五學生以為，《小世界》的實際運作仍未脫離傳統的客觀新聞學(見表二)。女性似乎比男性更認同新聞系以《小世界》作為社區媒體，發展公共新聞學的理念。

學生對《小世界》的認知，實受新聞系相關課程影響。2₁F6指出：「我以為《小世界》是一份社區報，因為老師和大二上的社區新聞課程都會說《小世界》是以公共新聞學的理念辦報」(I-2010/11/15)。在「小世界大三實習說明會」中，助理(AF)也一再強調「《小世界》以文山各社區為對象」，議題的發掘應圍繞在地性。此外，指導老師(TF)也會在編後會上重申《小世界》的公共導向，要求學生深入社區發掘更多問題。這些在在都影響學生對公共定位與新聞專業的認知，並以符合《小世界》制度和運作的方式體現新聞專業。

表二：男、女學生對小世界新聞定位的認知

新聞典範	男性		女性		總和	百分比
客觀新聞學	13	25.49%	22	21.15%	35	22.57%
小報新聞學	2	3.92%	3	2.88%	5	3.23%
公共新聞學	35	68.63%	75	72.12%	110	70.97%
其他	1	1.96%	4	3.85%	5	3.23%
總和	51	100%	104	100%	155	100%

註：99-1此題作答人數83人；99-2有72人。

曾任 99-1 總編輯的 E₁F1 表示，《小世界》雖然屬於社區報，但不太符合公共新聞學取向：

《小世界》的記者跟居民的互動不夠多、也不夠深。記者找線的方式大多只是簡單問一下最近發生的事，而不是長時間關切社區，也不是由記者本身投入，是透過里長或民代來轉述，感覺好像很疏離，像是第三者或第四者。我想如果真的要走向更實質的公共新聞學，同學就必須更投入。(I-2010/11/12)

由於學生時間有限，通常只有在找新聞線或採訪對象時，才會尋求里長或民代協助，故不易與居民建立信任關係，遑論主動挖掘社區問題。同期的副總編 (E₁M1) 也認為，儘管《小世界》強調公共新聞學的理念，但僅做到客觀報導，就連以公共新聞學為依歸的第四版「社區大聲公」，議題的發想都是由學生自己集思廣益，而非落實到社區參與去發掘議題 (I-2010/11/15)。

在參與觀察和訪談中，我們亦發現，認同《小世界》「公共」理念的學生，也常在實際運作中感到落差或無所適從。4₁F4 說：

四版在小世界的定位是屬於公共新聞學的範疇，但實際跑線後會發現我們比較是專題走向，沒有扮演公共新聞學說的民眾和官方的橋樑。……我們這個團隊採取的是預想狀況，然後大家從不同方向各自進行。雖然民眾表達的意見很多時候和我們預想的差不多，但我們的運作和課堂上教的是不一樣。(I-2010/12/3)

4₂M7 也表示：

四版和其他版不一樣，要找一個能夠符合社區公共利益的主題，能夠分成不同角度去探討。通常我們都會固定在禮拜五檢討會開完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像是 2004 期原本設定做巡守隊保衛社區的議題，但老師臨時改成巡守隊年齡過高，唉，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寫的稿子都沒有被採用。(I-2011/4/21)

其他版的記者也有類似困擾，認為《小世界》強調「新聞性更勝於公共性」。2_F13 即抱怨，原以為《小世界》是社區報，應多報導民眾的意見和關懷地方，但實際參與後卻發覺：「《小世界》沒有很社區報！我們跑的是行政版，還是要報問題，就和一般商業報紙差不多，也是要採訪行政機關、鄰里長。事件越有重大性和時效性，就越可能上報」(I-2010/12/7)。

5_F1 則直陳，《小世界》的新聞選擇也不全然由新聞價值決定，「新聞是由老師決定，有時可能因為重複性太高，或沒有畫面而被抽掉。大家為了上報，最後考量的不再是公共性的表現，而是指導老師對哪些議題、哪類新聞比較喜歡」(I-2010/11/16)。3_F11 也說：

我認為老師是想像這些居民要什麼，而在老師之下的總編、召集人、記者則是想像老師要什麼。在這裡，大家似乎都遺忘了原本社區報的意義，感覺起來好像都在迎合老師，常聽到大家在討論「不知道老師到底要什麼？」而不是「居民想看到什麼？這些訊息對他們有幫助嗎？」(I-2010/11/24)

大多數的學生坦承，「小世界實習」是一門課程，原則上還是以「及格」為考量。為避免新聞線被抽掉或被扣分，他們會盡可能投上

位者所好。參與觀察資料顯示，兩性對新聞被抽掉的反應截然不同：多數女生會表現出緊張、難過，四處向同學抱怨；相對地，男生則顯得平靜，但會追問事由，尋求合理解釋。

TF 也發現，學生只求過關而未確切履行公共新聞實踐：

《小世界》不只是社區報，也以公共為目標。但學生大多把它當成一門課，只是每週交作業，很少人願意 follow up，認真思考這個議題對社區居民有沒有用、重不重要？之前的問題是否有解決？很可惜。但我們還是秉持公共新聞學的理念，所有的報導都具有公共性，不像主流媒體充斥著八卦、消費的新聞，我們的新聞都和社區生活有關，只是學生學的東西還只是皮毛，而社區的問題也不是短期可以解決，所以要讓他們做到「解決問題」，的確有難度。(T-2010/12/23)

就此觀之，學生對《小世界》的「公共」認知，主要來自課程設計和學校定位，但在實際新聞生產過程中，其認知卻常與新聞實踐產生落差——學生除能確定採訪範疇是「社區」外，其餘的專業表現只能在日常新聞產製中，不斷與組織內部進行協商。

(二) 陰性化的新聞室運作

在 99 學年度《小世界》實習的學生中，男性只佔 33.7%。由於男女比例懸殊，因此在各項職務分配上，女性所佔人數遠超過男性（見表三）。不論是決定新聞方針的前端作業——即由助理、副／總編輯和各版召集人所組成的編前會，抑或影響新聞產出的後製端（由

編輯群在編輯台上進行編排、審閱），男性的人數皆屈指可數，³ 加上《小世界》的上位者又都是女性，導致《小世界》呈現陰性化的新聞室運作。

1. 版別選擇受同儕情誼左右，對女性影響尤劇

儘管《小世界》允許學生自由選擇職務和版別，但因八個版面是由三個班級一同實習，學生為了避免「無法共事」，在挑選版別前，或先各自招募組員並選出 1 名召集人，或由每班直接推出 2 名召集人，再與其他班級進行搶版。⁴ 因此，對多數學生而言，同儕相處的重要性遠勝於版別或路線的自由選擇。以 99-1 抽到行政版的乙班女生為例，雖然她們一致回應行政版相當棘手，但因好友都在同一版，就算跑線遇到困難或瓶頸，也能馬上尋求協助，應該比「單打獨鬥」更有利。

整體來說，女性選版時，不論在同儕互動或新聞屬性方面，更偏向以「情感」為依據，男性則會多加考量「興趣」和「專長」。如 99-1 選擇二、三版的男生多表示，選擇行政版是出於好奇和興趣，3,M13 說：

3 編前會由 10 人組成（扣除發行）：99-1 有 2 名男性（副總編和二版召集人），99-2 只有 1 名二版召集人。後製編輯工作每期 30 人：99-1 男性有 10 位；99-2 只有 2 位。

4 小世界有八個版面，頭版是重點新聞彙總，只設「編輯」一職；八版是財經版，記者必須經由財金系老師認可，所以三班學生能自行決定的只有六個版面，每班大致可分配兩個版。99 學年度上、下學期的選版方式有些不同：99-1 允許學生先行招募組員，再選出 1 名召集人；99-2 改變規定，每班各推出 2 名學生擔任召集人，直接和其他班級進行搶版。

之前在新聞人社團採訪時，比較沒有接觸到行政性質這塊。我覺得行政版應該挑戰比較大，雖然有壓力，怕會用詞不妥或出錯，但是硬性寫作對我們男生來說應該不難。(I-2010/12/3)

不同於男性，女性的首選幾乎都是藝文版（五至七版），這些版面的召集人也都是女性。6_{F1} 解釋：

私底下大家已經討論過了，都不喜歡行政版，覺得文藝類的大家跑起來比較好討論，也比較好找線，不會像行政版那麼麻煩，要配合公務人員的上班時間。藝文版的話，記者們都是六日比較有時間可以採訪，對女生來說也比較好寫，當然稿子也比較好改。(I-2010/10/20)

表三：99學年度小世界實習課程的學生職務分配

學期	99- 1				99- 2			
	男		女		男		女	
副／總編輯	1	(1.0%)	1	(1.0%)	0	(0.0%)	2	(2.2%)
正／副發行主任	0	(0.0%)	2	(2.1%)	1	(1.1%)	1	(1.1%)
召集人	1	(1.0%)	7	(7.2%)	1	(1.1%)	7	(7.8%)
小計	2	(2.0%)	10	(10.3%)	2	(2.2%)	10	(11.1%)
編輯	10	(10.3%)	20	(20.6%)	2	(2.2%)	28	(31.1%)
文字記者*	25	(25.8%)	45	(46.4%)	26	(28.9%)	50	(55.6%)
攝影記者	8	(8.2%)	3	(3.1%)	0	(0.0%)	0	(0.0%)
小計	43	(44.3%)	68	(70.1%)	28	(31.1%)	78	(86.7%)
總和	45	(46.3%)	78	(80.4%)	30	(33.3%)	88	(97.8%)
總計人數	123/97 (126.7%)				118/90 (131.1%)			

註：《小世界》的職務有些是兼任，如發行主任兼記者，八版召集人兼編輯；編輯一職也採輪替，即前八期擔任編輯、後八期記者或相反。99-1有10名男記者、18名女記者職務和編輯重疊；99-2則有2名男記者、26名女記者職務重疊。職務複選導致總和超出100%。

對女性來說，以人情趣味為主的藝文新聞比較好發揮，也不易出錯。因此，一旦沒搶到藝文版，女生的反應也相對激烈，一面感嘆「運氣欠佳」，一面抱怨「制度不公」；男生則多抱持隨緣的心態，如 2₂M8 說：「雖然有些可惜，但只要新聞方向說清楚，就會盡量配合版別屬性去採訪」（I-2011/5/30）。

2. 召集人的性別化風格

在兩學期七個版面中，各有 6 名女性召集人，她們充分發揮「他人導向」的女性特質，包含心思細膩、關心他人及人際協調——不僅在實習前「找人組隊」，進入實習階段後，她們除了幫忙記者找線、提醒須知、加油打氣並為其爭取分數外，也會居間協調同學或師生間的衝突。如 4₂F2 在編輯室內常抱怨召集人害她們拖版：「4₂F1 想讓大家（記者）都能上版，有上版分，我們好不容易排好的版，到最後她又要硬擠上一兩條稿子，整個又要重編」（PO-2011/3/4）。

相較之下，男性召集人則傾向「公事公辦」——要求記者先做好分內之事，若真有問題，再給予協助。例如 2₁M1 強調：「想要來行政版的人自然會成為組員，一切隨《小世界》的作業模式進行……我對組員，都只交代跑線工作和協調配線」（I-2010/10/12）。2₂M1 的作法則是訂下版規並公平對待每位記者，該版不僅作業流程順利，組員之間也不像其他版，並未傳出猜忌或分數的爭議。

觀察資料顯示，男、女召集人在面對壓力時，也有截然不同的反應。2011 年 3 月 4 日的編輯室內，二至四版的召集人都被要求補訪，3₂F1 和 4₂F1 忙進忙出地打電話，也一直拜託其他版召集人提供線索，神情顯得非常緊張。4₂F1 甚至把受訪者的名字寫錯，在編後會上，她因錯誤報導而被扣分，當場難過地哭了。反觀二版召集人，

當天雖然也要補訪，但 2₂M1 並未呼朋引伴，只是默默在一旁完成電訪。編後會上，2₂M1 因把關不嚴——旗下記者將里長的名字寫錯，導致發報當日所有人必須以立可白塗改頭版頭題，他也因此被扣分，但他並沒有顯露太多情緒（PO-2011/3/4）。

整體來看，男性召集人在陰性化的編輯室內，可能因為孤身一人而在待人處事上表現得較為理性，既不熱衷結黨，也不認為私人感情有利於新聞運作，反而以完成工作為目標來執行職務和與人應對。

3. 人際交情和權力關係

《小世界》雖是學生的實習刊物，但非由學生全權負責，TF 和 AF 仍主導重要議題的選擇和落實獎懲制度；其中 AF 更是直接對應學生，其工作包含參與編前會、改／退稿、協助編輯審大樣、挑錯字、規劃版面、定稿及計分。

觀察編輯室發現，《小世界》新聞室的運作比較「講情面」，以 99-1 二版召集人的表現為例，原本 TF 認為 2₁M1 在前四期的報線狀況不佳，未盡到召集人的責任而擬撤換，但在 AF 和總、副總編輯不斷說情下，決定保留其職務，僅將報線形式改由同學自行向 TF 說明。此例多少顯示《小世界》新聞室內的人情味——處理問題時，並未完全就事論事，而以「和諧」為考量。

正因如此，新聞室的決策程序也相對主觀。以編前會為例，即使其用意在審核新聞線，但因 TF 未列席，副／總編輯又只是學生，AF 遂成為決策者和仲裁者。會議時間訂在每週二中午，開會氣氛相當輕鬆，也容許遲到，各版召集人並未按照順序報線，報完的人也可逕自離去。5₁F1 坦言：「AF 是審核定稿的人，聽完她的意見就可以」（I-2010/11/16）。

有別於強調工具理性的科層制度，《小世界》的權力運作方式比較彈性化，但也隱微許多，主要受情感因素影響而出現「攀關係」的情形。例如 99-1 四版召集人經常買咖啡和點心慰勞 TF、AF 及該版編輯；而 99-2 的四版召集人原與同班的 E₂F1 較少往來，但因 E₂F1 當上總編，兩人變得異常熟絡，在編後會上甚至同坐一張椅子。學生意識到在《小世界》新聞室內，缺乏友情或感情交流是不利的，因為交情、關係及配合度是《小世界》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條件，不僅會加速作業流程，也會影響新聞的最終呈現。

訪談資料顯示，學生普遍認為，召集人如果與權力核心的關係友善，對其報線和編輯有加分作用；反之，若召集人被邊緣化，則整版在實習過程中較難得到奧援。2₂M1 即察覺：「如果你和 AF、總編或副總編的感情一般，在報線時，其他版的召集人不太會提供意見，因為沒有感情基礎，當然也沒有什麼幫助。不過，如果你和他們感情好，AF 就會仔細聆聽，大家也會熱烈討論」（I-2011/3/25）。這與編輯室的觀察吻合，AF 對待平日與她熟稔的召集人和編輯，態度比較親切也會給予協助，如版面規劃、標題建議、版面用色、檢查錯誤等，讓版面更為完美，並降低其被扣分的風險；但對其他人則較常用命令的口吻，如「不改那就不用拿給我看看」。5₁M7 曾質疑此作法：「可能是女性比較敏感吧，容易把別人的回答解釋為不滿。」他以為，AF 會將他的排版意見曲解為挑戰權威，但 TF 其實允許學生依照各自的版型概念去排版（PO-2010/11/10）。

除交情深淺外，學生的能力和配合度也會影響 AF 的協助意願。5₁M5 即坦言：「助教對我和 4₁M5 比較好，那是因為我們的動作快、錯誤少，配合度比較高」（I-2010/12/20）。其實 AF 之所以要求學生配合，原是為了加速《小世界》的運作，但看在學生眼裡，卻是「配

合度高=乖巧」，用以形塑權威。

在一旁協助《小世界》運作的大四學姐 HF2 也說：

在協助小世界的過程中，我遇到真正棘手的問題並不是稿件，而是得去幫忙解決衝突，像是召集人之間的衝突、召集人和記者、編輯、或是總編之間的衝突，有時甚至是和老師之間的衝突。這些都讓我很詫異，因為我比較期待大家在寫作或製作議題上有進步，而不只是將這個實習單位當作發揮人際關係或同儕競爭的場域。(I-2011/6/28)

由於人情介入新聞室的運作和成績計算，學生之間不免對此產生微詞，甚至經常發生衝突。由此看來，小規模、非正式的新聞室雖然講求和諧、人情味，但也易涉入個人情緒，進而影響新聞實踐。

(三) 性別化生存心態和新聞實踐

1. 性別化的資本挪用

問卷調查顯示，僅有近四成學生（37.25%）認為「性別」會影響其新聞表現。但從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性別以隱微的方式左右男、女性的新聞實踐。

(1) 女性的資本利用

對女生來說，採訪技巧、編輯排版、溝通、找新聞線等新聞專業的獲得，主要來自相關課程的學習和老師指導。2,F6 指出：「不管是報線或寫作方式，TF 都會告訴我們該從哪些方向去做」(I-2010/11/15)。除了聽取師長建議外，上網找尋相關資料，做好

萬全準備也是必要的。財經版的 8₁F2 強調：「平常找議題，除了看《天下》、《商周》、《今周刊》等財經雜誌外，也要看財經相關的書籍……我們的版比其他版更強調問題點，找受訪者一般都偏好有專業背景的人，報導才有分量，當然事前就要做充分準備，才能問深入的問題」(I-2011/1/10)。女生不僅從課程取得專業知識，也會廣泛蒐集相關資訊來增強自己的新聞資本和專業表現。

但有些女生也表示，她們因缺乏某些客體化資本，如手機上網功能或單眼相機，而造成採訪上的不便。沒有機車的 6₂F9 說：「當初運氣好搶到文山區，可是有些地方像是老泉街、萬芳社區，這些地方就算把地圖畫下來，還是會遇到路標不清、找不到路人等狀況，然後就很笨跑錯方向差點遲到」(I-2011/4/15)。6₂F13 也抱怨：「廢除攝影記者，實在太不人性化！沒有單眼相機拍的效果又不好，而且採訪當下也找不到適當的時機拍攝，或是剛好活動正在進行，民眾擋住鏡頭而沒有拍到畫面」(I-2011/3/16)。擁有單眼相機的女攝影記者 4₁F2 則說：

我們對單眼的掌握可能還不夠純熟，在《小世界》的攝影檢討會上，女生拍的照片最常被拿出來檢討，像是取景角度不對、沒有新聞重點。然後，男生又會說：「女生的攝影知識不夠是很正常，可以拍出這樣的照片已經很不錯。」雖然有時被指正是对的，但偶爾我還是會懷疑「會不會女性攝影取材的角度不同？」(I-2011/1/15)

在形體化資本上，多數女生也不諱言，採訪過程中會利用「女性特質」，包含乖巧形象、柔順姿態、委婉語氣等形體化資本，和

受訪者建立良好關係，累積社會資本。根據訪談資料，在女性的採訪經驗上，不少受訪者會主動提醒她們維護女性形象。2₁F6 憶起第一次採訪新店市代會秘書的經驗：「她告訴我『女生打扮應該簡單清爽一點』。」之後的採訪，她不僅穿著樸素，也會卸掉指甲油（I-2010/11/15）。削著一頭短髮、穿著中性的 4₂F10，也曾被受訪者指正「男性化的打扮不吃香」，導致她不太敢採訪中年男性，怕他們會批評其穿著打扮（I-2011/5/3）。而 4₂F13 則有自知之明：「我平常的裝扮可能會讓人覺得很騷、不正經，所以採訪時我會注意，就是褲子搭襯衫，也會刻意不上妝或只塗淡妝，讓別人看到我專業的一面」（I-2011/5/3）。女生普遍發現，《小世界》是社區報，受訪者主要是 30 歲以上的里長或居民，他們看待「女學生」就如同父母一般，因此「不化妝、不過分打扮、禮貌專業」便能營造好形象，同時也讓受訪者留下好印象。

不只是乖巧形象，柔弱亦是女性採訪的利器之一。4₁F2 即坦言：「雖然女性在男性擅長的攝影領域常被貶低，但身為女性隨著文字記者出去時，受訪者多半還是願意讓我拍攝。」她習慣以女性柔弱的一面，請求受訪者協助，「這是一種女性的優勢，是另一種溝通技巧吧！」（I-2011/1/15）

自認善用女性優勢的 3₁F11 也笑談其克服拒訪的「法寶」，「就是低聲下氣、不斷道歉或用撒嬌來討好對方」。她回憶當初為了採訪捷運施工的問題，苦苦哀求原本拒訪的店家，最後老闆終於心軟接受採訪，還主動提供後續消息。3₁F11 發現這招對異性受訪者似乎特別管用，「以女性無知的態度去討好或迎合男性，好像可以建立男性的自信心」（I-2010/11/24）。

顯然，「女性特質」在採訪過程中並非負向資本，也能為女性贏

得採訪機會和建立人脈，但有時也會為她們帶來困擾，特別是在採訪異性時，容易被調侃或刺探隱私（如問及「有無男友？」）。2₁F12、3₁F6、3₁F11 和 4₂F13 皆指出，採訪中年男子時，對方都曾試圖為其介紹相親對象，她們只能尷尬婉拒。

在《小世界》新聞室內，女生同樣也會利用與生俱來的資本，像是裝可愛，來為自己爭取機會，或央求男生協助、或博取師長同情。在 99-1 學期，攝影記者尚未廢除，3₁F11 為了行動方便，便常以嬌嗔的語氣拜託攝影 3₁M3 順道載她去採訪或發報。另在 99-2 分配職務之際，原抽到六版記者的 7₁M8 被要求禮讓給一位女生，因為她的男友在六版。7₁M8 事後說：「雖然沒什麼大不了，但因為對方是女生，大家就不忍心，所以我就當羔羊，當時真的很嘔！」此外，編輯 7₂F14 也曾為了頭版扣分之事，私下找 TF 幫忙，她不斷哀求，最後終於討回一分（PO-2011/5/6）。

除乖巧、柔弱外，女性的細心和順從也讓她們在《小世界》內更易生存。女生的書寫比較謹慎，較少因出錯而被扣分。當她們被要求改稿時，通常也會揣摩或順從上意而修改內容。一旦發現分數不足，她們會主動拜託召集人或好友協助，增加交稿機會，所以女生通過《小世界》實習的比例自然也提高。

（2）男性的資本利用

不同於女性，男性在訪談中較少提及形體化資本，反而多著墨在如何利用新聞資本（如專業知識）和象徵資本（如記者身分）說服對方接受訪問。2₁M9 強調，實習記者應具備採訪技巧，且須視不同對象隨機應變：

採訪時，當然裝扮都會稍加留意，就是不會穿夾腳拖，看起來要

乾淨整潔，這是表達對受訪者的尊重。……怎麼採訪會視情況而定，像是公務人員比較適合電訪，因為公務繁忙，要先打電話詢問對方「方不方便講電話」，再表明來意。在電訪時會用敬語「您」；結束時說「不好意思，打擾了」；如果是用面訪，會先禮貌說明自己是「小世界實習記者」，然後遞名片，如果對方是里長就用台語先打招呼，增加親切感。(I-2010/12/5)

多數男生表明自己雖然只是「實習記者」，但受過專業訓練，對受訪者的態度不必卑躬屈膝，而是互相尊重。4₂M8 道出其策略：「採訪時，就不要表現出太強勢，要客氣、有禮貌，用『請問』開始，提出的問題也要半開放，不要預設特定答案」(I-2011/4/29)。7₁M10 也說：「從大一到大三的新聞課程中學到新聞稿必須實事求是、客觀報導，所以如果採訪對象回答不清楚，會繼續追問」(I-2010/12/27)。2₁M9 也提及「追問」和「確認」對新聞報導的重要性：「如果受訪者沒有聽懂問題，或我對他們的答案存疑，就會再三和對方確認。除非他們表現出很匆忙或不耐煩，才會停止追問。」他甚至談起早先被拒訪的經驗：「對方（公家機關）一直拒訪，所以我就改變態度，我覺得面對政府單位，採訪態度要嚴肅、正經，並且要加快說話語氣，讓他們有壓迫感，就不會拒訪」(I-2010/12/5)。

訪談中發現，跑行政版的男性遇到拒訪時較不會放低身段，反而會據理力爭，再尋找更上層的受訪者，如 3₁M7 曾被受訪者投訴「不禮貌」，原因是當初和他接洽的受訪者請他「休息時間過後再打」，他誤以為是拒訪而向上級反應，導致該單位的負責人受到責難。

顯然，兩性的採訪策略極為不同。女生以為，「實習記者」的象徵資本較不具專業意義，所以選擇「放低身段」，要求受訪者體諒其

為「實習生」，以期獲得回應；「學生」身分確實能降低受訪者的心防，但易淪為下對上的關係。相反地，男生則以「記者」身分自居，強調雖然在實習但能運用新聞專業，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和受訪者相處，取得可靠資訊。

在《小世界》新聞室內，男性同樣也不易屈服於權威或組織規範。多數男生指出，副／總編輯和召集人都是同屆同學，新聞能力和自己不相上下，「位階高低不代表新聞專業度不同」。2₂M7、5₁M13、7₁M10 都曾聲明，「所有跑《小世界》的同學都是實習生，他們的建議不見得就正確」。2₁M14 曾寫一則「清查未立案寺廟」之新聞，被總編要求修改，但他堅信其寫作方式與立場很好而未修改；在被告知無法上版時，2₁M14 將此報導直接拿給 TF 看，最後成功在 1993 期刊出。另以 7₂M7 的「先斬後奏」為例，召集人抱怨 7₂M7 常以「先採訪，後報線」的方式挑戰制度——等新聞跑好後，再要求召集人「一定要上報」（PO-2011/3/16）。

除此之外，男生在《小世界》新聞室內，也常主動或被迫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禮讓或提供女性協助。例如同樣是攝影記者，3₁F2 以不會轉檔照片為由，請 3₁M3 從旁指導，最後 3₁M3 被哀求直接為她轉檔，並整學期提供此服務。大抵來說，男性將數位科技等客體化資本應用在新聞工作上，似乎比女性略勝一籌。當攝影記者在 99-2 學期被廢除之際，女生對此的「不便」反應明顯比男性嚴重，如 7₂F3 抱怨：「攝影要眼明手快，當你要採訪又要拍攝，時間真的很趕！」男生則將此規定當成實習的一部分，並未對此特別表態（I-2011/6/10）。

其實，不僅是「攝影」，男性在硬性新聞的整體表現上也優於女性。以四版專題為例，4₂F1 發現兩性對新聞議題的敏感度和興趣不

同，導致其在議題發想和尋找路線時有明顯差異：

男生的線比較符合老師的期待，因為他們對政策和硬性主題比較感興趣，所以報線比女生更容易通過……以 2007 期我們做的「網路領養」來說，女生會想報導領養人的善行，男生則會關注網路領養所衍生的問題。(I-2011/4/29)

4₂F1 指出，四版剛開始因抓不到方向，讓她很擔心：「我們原本發想的主題都是軟性面向，類似報紙的生活版、消費版。但老師說：『四版是八個版中，唯一開放給民眾發聲，希望能夠形成公共論壇。』所以她很重視主題有沒有符合社區利益，我們才朝向政策面思考，像是探討政策的缺失或問題。」相較於女性，版內的男記者不僅願意尋找主題，也會協助她完成四版的任務，「我們版的女生患有『公主病』，每天都打扮得光鮮亮麗，遇到很多事都不會思考，希望有人為她們解決，好像那種有臉蛋不做事的公主」(I-2011/4/29)。由於該版的女記者開會常無故不到或拖稿，導致男生不得不扛起重責，並以「不計較」的心態體諒女生；而女生雖然被戲稱「得了公主病」，卻也不以為意，反而落得清閒。在此過程中，男性似乎也從女性的依賴獲得某種自信，從而建立其威望。

正因為社會對「男性」的期待，男生也比較願意堅持己見、挑戰權威、獨當一面，甚或不拘小節。但這些男性特質有時反而阻礙他們通過《小世界》實習，如 2₁M14 曾努力爭取讓新聞上報，卻因出錯而被倒扣，他悻悻然說：「《小世界》只有兩學分，卻需花許多額外的課餘時間去採訪和發報……投資報酬率不高，每期交稿也不保證一定會過。」導致他興趣缺缺，最後選擇放棄 (I-2011/1/10)。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在採訪過程中，女性善用形體化資本，不僅不易被拒訪，也能和受訪者建立關係，累積其社會資本；相對地，男性則多抱怨自己缺乏女性的「外在」優勢而被拒訪，只能以新聞和象徵資本說服對方接受訪問。另在寫稿方面，女生的書寫比較謹慎，也願意順從上意修改內容；男生則比較粗心，較常出現錯字、弄錯單位名稱，對所寫的內容比較堅持，會據理力爭。TF 也察覺此現象，她以為學生的寫稿能力普遍有待加強，不過女生比較認真，採訪的內容相對豐富，但邏輯卻不如男生，所以經常需要重組段落或整篇改寫。她強調：「整個新聞流程其實和性別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新聞的要求都是一樣。不過，學生現在都還只是初學者，女生因為比較細心又耐得煩，所以才會比較 OK」（I-2011/1/5）。

2. 性別化生存心態與族群面向交錯

《小世界》是社區報，經常需接觸底層年長的民眾，因此不論男、女生，若能說台語或有地緣關係，自然比其他人更具優勢。99-1 本省籍的攝影 2₁M3 常陪同文字記者前去採訪，他發現許多女生不會說台語，因而無法拉近和居民的距離，「我就幫忙她開場、問問題，讓對方感覺輕鬆一些，這樣他們比較願意講」（I-2010/12/17）。

本地生尚且如此，何況僑生。《小世界》有 7 名僑生，因僑居地的生活用語、口音和文字應用不同於台灣，故在採訪溝通或新聞寫作上，除了性別因素外，文化差異也加深其新聞實習的困擾。如前述 3₁M7 曾被投訴「採訪不禮貌」，4₁M11 也遭遇相似的責難，兩人同樣是馬來西亞僑生，後者因向 AF 詢問扣分理由而被斥責「不禮貌」；兩人都對此反應：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不當的行為。

此外，社區版的 4₁F13 也指出，文化風俗的差異讓她無法理解本

地居民的問題：「雖然同樣都是華人，但是彼此的文化習俗卻大不相同，像是中秋節烤肉，我們根本不會這樣做，而且我們也比較隨性，更不會去討論在哪裡烤肉是違法。或是像騎樓路霸之類，這些在馬來西亞都不會是問題」(I-2010/10/26)。同版的香港僑生 4_{F7} 也表示，除了生活差異外，自己更擔心粵語音調過重不利於採訪，加上又聽不懂台語，所以每次只能央求攝影 4_{F2} 陪同採訪，適時給予協助。這也凸顯僑生在《小世界》新聞採訪上有語文隔閡，遑論具備在地意識。

3. 性別化的新聞實踐

從訪談資料來看，學生普遍喜歡採訪中年婦女，因為她們有媽媽的感覺，態度溫和也比較不會拒訪。此外，學生在挑選消息來源時，也會受他們對議題認知的影響。4_{M5} 提及他在〈走路上學計畫〉的採訪：「那期我必須採訪家長的意見，很奇怪一提到家長，我腦中自然浮現一位中年婦女。」他表示，家長雖然是中性詞，但只要想到接送上下學，便不自覺坐入「男主外、女主內」的迷思。身為編輯的 4_{M5} 也坦承，四版受訪者的性別常因主題而異。議題如果偏向硬性新聞，如碧潭改造、台北好好看系列等漏洞探討，記者在採訪時會偏好男性受訪者；反之，若是軟性、居家議題，如走路上學、家醫制度等，則以女性為主 (I-2010/12/22)。顯然，學生在採訪時還是容易受到文化價值影響，而有刻板的選擇。

至於書寫風格，問卷調查顯示，學生普遍認為男性書寫特性是理性、少用形容詞、內容較制式化；女性則相對比較感性、多用形容詞、議題比較多樣且具關懷面（見表四）。在訪談中，許多男性也指出，新聞應符合字數限制，故其寫作原則是把握重點、簡短扼要；而

女性卻持相反的論點，認為字數應由編輯控制，新聞稿應提供豐富的內容，所以她們偏好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

表四：《小世界》學生對男、女記者的新聞寫作特質之認知

	男記者的寫作特質		女記者的寫作特質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理性	118	77.12%	11	7.19%
感性	4	2.61%	103	67.3%
較少形容詞	69	45.10%	2	1.31%
善用形容詞	21	13.73%	78	51%
多煽動性	30	19.61%	23	15%
多關懷性	3	1.96%	63	41.2%
文字口語化	48	31.37%	40	26.10%
較文言文	12	7.84%	12	7.84%
內容制式化	60	39.22%	16	10.50%
內容多樣化	12	7.84%	63	41.20%
嚴肅	54	35.29%	5	3.27%
有趣	6	3.922%	21	13.70%
總合	437	285.62%	437	285.62%

註：此表為複選題，共153人作答（49位男性、104位女性）。

兩性對新聞寫作的不同認知，也反映在實際書寫上。7₁F1 說：

男生寫稿通常很少有情緒性的形容詞出現，我在看稿時就會很清楚知道事情的原因和結果，但缺點就是很容易出現文言文的感覺，或是很容易用字遣詞像鬼打牆地一直重複，畢竟少了形容詞的通順。而女生就相反，形容詞比較多，容易有主觀的用詞，但是好處就是，比較有故事性，我比較看得懂，缺點就是太冗長，

常常刪稿就會刪掉一段這麼多！（I-2010/12/22）

儘管學生以為性別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新聞書寫，但「版面特性」才是真正左右新聞表現的關鍵。由於《小世界》有行政、社區專題、校園、藝文及財經等不同性質的版面，因此學生在決定新聞主題、消息來源、書寫方式或排版風格時，都必須符合該版的「版性」要求。例如行政版以馬路施工等公共工程為主，消息來源自然是公家機關和專家，記者在寫稿時也採用平鋪直敘的方式，不像藝文版可以採用軟性書寫（如以疑問句開場），強調人情趣味。7₁F1 即表示：「相較於其他版面，我們版的『新店風情畫』新聞常會讓人在採訪或寫稿的過程中非常感動，也就是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情！」（I-2010/12/22）她覺得七版的寫作格式不像行政版，既可抒情也能敘述細節，非常適合女生，所以該版的女記者自然有成就感。

由此觀之，《小世界》對各版的專業規範，直接影響記者的專業表現。一旦記者的性別化生存心態不符合該版的專業屬性，實習過程中便會出現較多的掙扎與適應問題，例如行政版的女記者多反映「在找線和寫稿時特別辛苦」，因為無法掌握行政版的新聞重點，她們會開始揣測「老師比較喜歡這個……」，而且也多提及「寫稿時必須採用文言文，不能太口語」；相對地，男記者則較少有這方面的困擾。

（四）兩性發展出性別化的對抗策略

由於陰性化的新聞室運作容易受「關係」影響，因此有關「交情影響分數」的耳語四起，被扣分的學生自然質疑分數的公平性。參與觀察和訪談的資料顯示，女生面對「沒上報」或「大幅改稿」

之事，比較會私下抱怨，但為了分數，最後還是會按照上面的指示努力配合。如 7₂F2 曾抱怨：「有次大樣出來，文稿出現『某某表示』，TF 希望改成『某某說』，但這篇稿子原來就是『某某說』」（I-2011/5/13）。

女生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上層的作為，一旦發現自己或好友的權益受損，便會同仇敵愾，甚或群情激憤，要求上位者重新考核。以 E₁F1 私自代替五版記者去採訪校籃比賽為例，五版記者質疑她是公器私用，並戲稱其為「搶分狠角色」，女記者們甚至連署杯葛，要求上位者說明：「這是內部運作的新條例，還是總編個人行為？」有趣的是，該版的男記者雖不滿 E₁F1 的作為，但未加入討伐，他們選擇「做好記者本分就好」；當事過境遷，他們也不像女生仍耿耿於懷（PO-2010/10/6）。

另外，同期的 4₁F1 要求該版記者交線，但又擔心被退線而事先做了篩選，當她向 TF 匯報新聞線時，聲稱這些是自己發想，導致 TF 在檢討會上斥責該版記者。女記者們知道真相後，雖然未罷免 4₁F1，但已私下撻伐此事並形成輿論，要求上層保住記者的報線分數；4₁F1 的職務也因此形同虛設，眾人已無法再信任她，只是維持表象的和諧（PO-2010/11/2）。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 99-2，3₂F1 因報線情況不佳而讓 TF 有些微詞，總編 E₂F1 於是私下告知三版記者：「以後我會接管三版，你們如果斷線或想跑線可以來找我。」此舉引發三版女記者們的困惑與不平，認為三版之所以線不足，是因為人手不夠（如 7₂F3 被調往七版），而非召集人的問題，E₂F1 不應乘人之危，試圖藉此贏得 TF 讚賞。儘管女記者們埋怨 E₂F1 的作為，卻沒人願意對 TF 反應，只是在臉書上砲轟；3₂F2 笑說：「幹嘛鬧到提著頭去找老師，想想就覺得

害怕」(PO-2011/3/19)。

不同於女性，男性對扣分或新聞處理感到不滿時，比較不會群起發難，而是直接詢問上位者，試圖瞭解箇中原委。如 3₁M7 曾因錯誤報導而被扣分，但他拿出錄音資料，直接向 TF 證明確有其事，「我不會找 AF，因為很多人說她會誤解我們的意思，我不想讓雙方變得尷尬，所以直接發信給 TF，請她幫忙」(I-2010/12/17)。

除了「分數」之爭，99-1 也發生一起「發報」的性別爭議。負責發行的 2₁F6 和 2₁F12 接獲 3₁M14 在臉書上投訴，認為「發報有男女不公」的問題，他質疑「為何有機車的男生就須多負責一百份報紙？」並控訴兩位發行主任有性別歧視之嫌，故意刁難男生。此事引發臉書筆戰，多名女記者加入聲援，強調「男性應該大方，體恤無機車女性的不便」。由於其他男性並未提出異議，3₁M14 孤掌難鳴，最後便不了了之 (PO-2010/9/25)。

3₁M14 其實提出一重要課題：在性別平權的今日，兩性在新聞室內是齊頭式平等——即不論體態、資源多寡，任何職務或工作分派都應一視同仁；還是該考量性別差異而有不同要求——如男性因擁有強壯特質和機車、相機等客體化資本，就應多付出一些？這樣的問題在講求人情的《小世界》新聞室內，並沒有被充分辯論，而是直接被貶抑為「自私」行為。

總結來看，在陰性化的新聞室內，兩性發展出不同的抗爭策略。在人數上，男記者是少數，加上文化對男性的期待與個人的性別化經驗，他們傾向單打獨鬥，並採用公事公辦的策略；反之，佔多數的女記者們不但善用女性特質，有時也採用女性主義反應，如主動反擊，要求男性正視生理差異，試圖以女性群體的力量扭轉情勢或取得支持。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小世界》社區報為個案，試圖瞭解準記者在非主流的新聞室內，如何協商其性別認同和專業實踐，結果有四項發現。首先，在以女性為主的新聞室內，不會讓女記者感到女性特質是負面資本，反而強化其信心，使其認定「兩性在新聞表現上沒有太大差異」。但就兩學期的參與觀察，我們亦察覺人際關係和交情易滲入《小世界》的實際運作，造成上位者和同儕間的拉攏與排擠，雖然女性經常彼此支持、情義相挺，但也不時傳出口舌與衝突。這也說明陰性化的新聞室雖然顧及眾人需求，不像傳統科層制以「專業競爭」、「職責分明」為尊，但也易因私交而衍生其他問題。

其次，《小世界》雖然允許學生自由選擇職務和版面路線，但因三個班級一同實習，學生傾向以同班兼好友為選版依據，這似乎擺脫傳統「性別」對記者的限制，如女性不適合跑行政版。不過從反向來看，此亦似女性特質使然，《小世界》以女生居多，女生又喜歡和好友在一起，因此放棄自由選版的機會，而這種運作透過口耳相傳，也形成某種慣例。

這顯示性別特質並非固定不變，而會在場域內／外持續被建構與建構。此與 Monica Lofgren-Nilsson、Gertrude J. Robinson 等人的發現吻合：新聞室是性別化的場域與過程，不是個人帶性別到組織裡，而是性別被整合至組織的過程，包含個人的性別經驗、組織的勞務分配、社會的性別角色，以及文化的性別迷思。性別不再是生理屬性，而是一連串的社會實踐，是個人在新聞場域內，衡量其處境並挪用適當的資本，不斷地「做」出性別，同時也產出新聞。

從《小世界》的個案分析，不僅可以看到新聞室的組織／性別

運作如何影響兩性的新聞實踐和性別認同，同時也能察覺兩性在結構限制底下，如何利用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其他資本，為自己增加優勢或進行反抗。例如有些女性以「柔弱」的形體化資本，要求受訪者或師長給予協助；表面上，這似乎是本「性」作用，但其實是「策略性挪用」——個人運用其所擁有之物去因應場域的要求。儘管每位學生採用的策略不盡相同，但在新聞生產過程中，我們發現兩性的資本挪用大致符合主流文化和性別意識型態的要求，此可能強化性別刻板，長久也不利於女性成長，像是女生發現「放低身段」可獲得採訪機會，而繼續採用此法。

第三，儘管《小世界》社區報以公共新聞學為導向，但實際運作（包含版面規劃、版性定位、跑線和新聞生產流程）仍未脫離傳統的專業規範；學生為了順利跑線，傾向採用傳統作法。這和國外的一些研究發現相符：學生傾向支持傳統新聞實踐更勝於公共審議（McDevitt, Gassaway, and Perez, 2002）。Tanni Haas（2007: 193）指出，美國的新聞課程 84% 以新聞實務為主，僅 12% 的課程內容涉及公共新聞學的主題，學生並未充分瞭解如何落實公共理念，導致學生普遍不支持公共新聞學的激進實踐（如促成市民會議）。

其實不只學生，美國新聞組織內的記者也傾向以傳統方式報導在地問題，更甚於促成審議論壇（Haas, 2007: 189）。公共新聞學因此被視為一種保守的改革運動（Schudson, 1999）或專業意理的擴張——即由記者設定議題，再協助居民瞭解問題所在（Ahva, 2012）。《小世界》的個案也說明，新聞組織雖然採用公共新聞學，但其理念若不能併入新聞生產過程，反而會使實習記者無所適從，最後只能採取他們熟知的傳統作法，甚至為了上報而不惜揣摩上位者的偏好。

第四，《小世界》為了讓新聞如期出刊，仍以傳統的新聞生產為

主，如行政／硬性、藝文／軟性。兩性在實習期間，其性別化生存心態若能符合各版的專業屬性，便如魚得水，如跑藝文版的女記者；反之則須經歷更多協商，例如女生進入行政版便開始學習「理性」思考與書寫，透過「認真」（努力跑線和盡力修改）來彌補所謂「專業」的不足；而男生則不須經過太多掙扎，便能掌握硬性新聞的特性。

就此觀之，未考量傳統新聞生產的缺點與性別運作，僅以「公共」為旨趣的新聞實習，似乎仍無法挑戰傳統新聞學在專業判斷和新聞實務上的性別偏見，例如《小世界》的社區版雖然給予民眾更多機會發聲，但實習記者仍習慣依主題的硬／軟屬性來尋找男／女受訪者。此顯示，公共新聞學雖然察覺專業新聞的菁英導向，而要求記者反映少數族裔和婦女的需求與聲音，但未反思主流社會和新聞運作的性別問題，導致記者仍以公／私領域、硬／軟議題來尋找受訪者，從而強化性別刻板。

為此，本文呼應 Kelley（2007）的主張：新聞教育應發展一套具有反思力和反身性的課程，亦即實務課程不僅應重視新聞的「公共性」，更應協助學生以批判方式，尤其是培養性別意識，反思性別經驗和新聞實踐的關係，以瞭解二元性別觀如何影響新聞室的性別運作與現有報導，尋求改變的契機。

附錄一 問卷調查

同學你好，我們正在進行國科會的研究計劃，調查報業組學生對小世界新聞實習課程的看法和態度。麻煩你針對目前的修課與實際發生情況填寫問卷，感謝你的配合。

世新新聞系 林宇玲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所屬版面 二版 三版 四版 五版 六版 七版 八版
3. 職位 正副總編 召集人 記者
編輯：前八期 後八期

二.興趣與版面調查

1. 你是否喜歡自己所屬的版? 是 (請填第 2 題) 否 (請填第 3-5 題)
2. 你喜歡的原因為何?
興趣 發揮空間較大 新聞類型書寫 (拍攝/編輯)較容易 熟悉該版區域環境 同學因素 不易出錯 採訪容易 較易上報 較易上頭版
其他 _____ (至多可複選四個因素，填完請直接填寫第 6 題)
3. 你不喜歡的原因為何?
沒有興趣 發揮空間較小 新聞類型書寫 (拍攝/編輯)較困難 不熟悉該版區域環境 同學因素 易出錯 採訪不易 不易上報 不易上頭版
其他 _____ (至多可複選四個因素)
4. 如果可以任意選擇，你最想到哪一版?
二版 三版 四版 五版 六版 七版 八版
5. 原因為何?
興趣 發揮空間較大 新聞類型書寫較容易 熟悉該版區域環境
同學因素 不易出錯 採訪容易 較易上報 較易上頭版
其他 _____ (至多可複選四個因素)
6. 你是否喜歡自己的職位? 是 (請填第 7 題) 否 (請填第 8-10 題)
7. 喜歡的原因為何?
興趣 發揮空間較大 熟悉該職位工作 同學因素 較易拿分
其他 _____ (至多可複選三個因素，填完請直接填寫新聞認知與專業調查)

8. 不喜歡的原因為何？
沒有興趣 發揮空間較小 不熟悉該職位工作 同學因素 較不易拿分
其他 _____ (至多可複選三個因素)
9. 如果可以任意選擇，你想要擔任哪種職位？
正副總編輯 召集人 編輯 文字記者 攝影記者

三.新聞認知與專業調查

1. 你個人偏好何種新聞典範？
小報新聞學 客觀新聞學 公共新聞學
其他 _____
2. 你認為小世界報導屬於哪種新聞典範？
小報新聞學 客觀新聞學 公共新聞學
其他 _____
3. 你認為目前小世界在社區中扮演何種角色？
提供民衆生活資訊 以報導社區問題為重的報紙 政府和學校等機關的宣傳工具 以報導社區溫情趣事為重的報紙 有效解決社區問題 有助凝聚社區力量 可作為民衆討論社區議題的平台
其他 _____
4. 你認為小世界的記者應該？
關注新聞問題的衝突點 關懷社區人事物 理性客觀報導新聞 和居民共同討論新聞議題 提供居民生活資訊 揭發弊端 主動找尋新聞問題解決辦法
5. 你認為新聞寫作的重點為何？
引起閱聽人好奇 中立客觀 促使民衆討論 文字精準簡潔
6. 你認為性別是否會影響到製作新聞時的呈現？
會 普通 不會
7. 你認為男性記者的新聞寫作有以下哪些特質？
理性 感性 內容製式化 內容多樣性 多煽動性 少形容詞 多形容詞
文字口語化 文字較文言 有趣 嚴肅 多關懷性 (至多可複選 3 個因素)

8. 你認為女性記者新聞寫作有以下哪些特質？
理性 感性 內容製式化 內容多樣性 多煽動性 少形容詞 多形容詞
文字口語化 文字較文言 有趣 嚴肅 多關懷性 (至多可複選 3 個因素)
9. 你認為新聞性質(硬/軟性)是否影響新聞的呈現？
會 普通 不會
10. 你認為硬性新聞的特質為何？
理性 感性 內容製式化 內容多樣性 多煽動性 少形容詞 多形容詞
文字口語化 文字較文言 有趣 嚴肅 多關懷性 (至多可複選 3 個因素)
11. 你認為軟性新聞的特質為何？
理性 感性 內容製式化 內容多樣性 多煽動性 少形容詞 多形容詞
文字口語化 文字較文言 有趣 嚴肅 多關懷性 (至多可複選 3 個因素)

四. 採訪行動調查

1. 你平時如何蒐集新聞線？
實地走訪 電話詢問消息來源(例：里長、里辦公室) e-mail 詢問消息來源
msn 等即時訊息詢問 官方網站查詢 網路社群(例 Facebook) 或論壇
不主動蒐集 搜索引擎
其他 _____ (請依頻率最常、經常、偶爾表示 1、2、3)
2. 你平時如何聯絡受訪者接受約訪？
當面口頭約訪 e-mail msn 等即時訊息詢問 網路社群(Facebook、plurk 等) 透過他人
其他 _____ (請依頻率最常、經常、偶爾表示 1、2、3)
3. 你是否有被拒訪的經驗？是(請填第 4 題) 否
4. 請簡述當時的情況及拒訪理由

五.科技使用調查

- 在參與小世界的過程中，你如何利用電腦/網路科技？請在有使用的科技選項前打勾，並寫下使用的機會和情形。

Facebook(臉書)：_____。

e-mail：_____。

搜尋引擎（例如奇摩、Google 等）：_____。

PTT(台大批踢踢實業坊)：_____。

官方網站：_____。

（請舉例寫出使用頻率最多的幾個官方網站）

_____。

其他：_____。

- 在小世界的新聞工作中，你如何使用手機來幫助你的新聞工作？有哪些優點、缺點？

- 除了上述提過的科技外，你還有沒有使用其他科技？

- 科技的使用在你參與小世界的過程中有哪些幫助？

問卷填寫完畢，謝謝你的配合，祝實習順利。

附錄二 訪談大綱

針對不同職務，詢問選擇職務動機、新聞流程（採訪前、中、後）、性別經驗及《小世界》的人際互動。

1. 請問你選擇當記者（或召集人、攝影）的原因為何？
2. 在採訪前，你會做哪些準備？
 - (1) 如何收集資料？
 - (2) 如何選擇問題或主題？
 - (3) 如何選擇採訪對象？特別針對年齡、性別、職業？
 - (4) 如何決定採訪形式？
3. 在採訪過程中，你會如何應對？
 - (1) 如何穿著？
 - (2) 如何和受訪者互動？是否會因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或職業而有不同態度？或選用不同的採訪技巧？能否以具體例子來說明？
 - (3) 採訪時，若被拒絕、誤解或打斷，你會如何面對？能否以實際經驗來說明？
 - (4) 你覺得自己在採訪過程中，最擅長哪種議題？和什麼樣的消息來源互動？
4. 在採訪後，你如何處理新聞？
 - (1) 你如何理解自己所選新聞版面的版性？（如適合什麼樣的新聞？什麼新聞容易上版？）
 - (2) 你覺得自己適合寫什麼性質的新聞？面對自己的版性，至目前為止，你一般都怎麼做？
 - (3) 你會依據哪些標準來撰寫或修改新聞稿？

- (4) 如果你的稿子被退或刪改，你都如何面對？為什麼？能否以實例來說明？
 5. 在擔任記者（或召集人、攝影）時，你覺得自己的性別對新聞工作有無影響？
 - (1) 你覺得身為男（或女）性，對你目前的工作最有利的地方是什麼？可否舉實例來說明？
 - (2) 你覺得身為男（或女）性，對你目前的工作最不利的地方是什麼？可否舉實例來說明？
 - (3) 在《小世界》的學習環境中，女生人數比較多，你對此有沒有什麼想法（如對自己版面或對整個《小世界》的新聞運作）？對你跑新聞有沒有什麼影響？
 6. 在《小世界》，你和其他人是如何互動？
 - (1) 你和召集人（或總副編輯、TA、老師）是如何互動？有沒有愉快或不愉快的經驗？
 - (2) 召集人（或總副編輯、TA、老師）有沒有給你一些幫助？有無發生讓你印象深刻之事？
 - (3) 你和其他男女記者之間是否互動？你們之間的關係是競爭性或合作性？有沒有什麼具體實例？
 7. 最後，能否分享一些在跑《小世界》的特別經驗（如失意、煩躁或衝突）？
- PS 如果職務是編輯，在新聞流程則改成問：編輯前、編輯過程、編輯後。

參考文獻

- 林宇玲 (2008) 《兒童與網路：從批判角度探討偏遠地區兒童網路使用》。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 林鶴玲 (1998) 〈政經、社會新聞中的女性形象〉，古玲玲主編《大眾媒體兩性平等教育研討會論文集》，II - III -1- II - III -7。台北：教育部暨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
- 蕭蘋 (2004) 〈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1: 85-123。
- 賴維真 (2003) 《女性新聞工作者勞動經驗之研究》，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 Ahva, L. (2012) Public jou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reflexivity.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14(6): 790-806. doi: 10.1177/1464884912455895
- Ali, C. and Conrad, D. (2015) A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Emerging dynamics in the community media paradigm.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1): 2-23. doi: 10.1177/1742766515573970
- Allan, S. (1998) (En)Gendering the truth politics of news discourse. In C. Carter, G. Branston, and S. Allan (Eds.), *News, gender and power* (pp. 121-37). New York: Routledge.
- Beam, R. A. and DiCicco, D. T. (2008) When women run the newsroom: Management change, gender and the new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arriott Downtown, Chicago, IL., August 6 [online] . 2009/12/10.
Available: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71199_index.html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812507
- Bourdieu, P.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 Carrington, V. and Luke, A. (1997) Literacy and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A reframing. *Language and Education*, 11(2): 96-112. doi: 10.1080/09500789708666721
- Carter, C., Branston, G., and Allan, S. (Eds.) (1998) *News,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ambers, C. (2005) Masculine domination, radical feminism and change. *Feminist Theory*, 6: 325-346. doi: 10.1177/1464700105057367
- de Bruin, M. (2000) Gender,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1(2): 217-238. doi: 10.1177/146488490000100205
- Devine-Eller, A. (2005) Rethinking Bourdieu on race: A critical review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habitus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qualitative literature. [online] . 2008/3/10.
Availabl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1858996_Rethinking_Bourdieu_on_Race_A_Critical_Review_of_Cultural_Capital_and_Habitus_in_the_Sociology_of_Education_Qualitative_Literature
- Djerf-Pierre, M. (2005) Lonely at the top: Gendered media elites in Sweden.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6(3): 265-290. doi: 10.1177/1464884905054061
- Djerf-Pierre, M. (2007) The gender of journalism: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e fie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dicom Review*, Jubilee Issue: 81-104.

- Dumais, S.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1): 44-68. doi: 10.2307/3090253
- Gallego, J., Altes, E., Canton, M. J., Melus, M. E., and Soriano, J. (2004) Gender stereotyp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s. In M. de Bruin and K. Ross (Eds.), *Gender and newsroom cultures: Identities at work* (pp. 119-142).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 Gill, 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lasser, T. L. (1999)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3-18).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Haas, T. (2003) Importing journalistic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c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Denmark.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8(2): 90-103. doi: 10.1177/1081180X02251049
- Haas, T. (2007) Public journalism: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18: 185-197.
- Haas, T. and Steiner, L. (2006) Public journalism: A reply to critics.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7(2): 238-254.
- Kelley, B. (2007) Teaching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26(2): 3-31.
- Kurpius, D. (2002) Sources and civic journalism: Changing patterns of reporting?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4): 853-866. doi: 10.1177/107769900207900406
- Lather, P. (1992) Critical fram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Feminist and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s. *Theory into Practice*, 31(2): 87-99. doi: 10.1080/00405849209543529
- Lavie, A. and Lehman-Wilzig, S. (2005) The method is the message: Explaining

-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gender and news produc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6(1): 67-69.
- Lofgren-Nilsson, M. (2009) 'Thinkings' and 'doings' of gender: Gendering processes in Swedish television news produc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4(1): 1-16. doi: 10.1080/17512780903119693
- Lowrey, W., Brozana, A., and Mackay, J. B. (2008) Toward a measure of community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 275-299. doi: 10.1080/15205430701668105
- Massey, B. (1998) Civic journalism and non-elite sourcing: Making routine newswork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94-407. doi: 10.1177/107769909807500213
- McDevitt, M., Gassaway, B. M., and Perez, F. G. (2002)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civic journalists: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1): 87-100. doi: 10.1177/107769900207900107
- McNay, L. (1999) Gender, habitus and the field: P. Bourdieu and the limits of reflexiv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6(1): 95-117. doi: 10.1177/026327699016001007
- McNay, L. (2000)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Nichols, S. L., Friedland, L. A., Rojas, H., Cho, J., and Shah, D. (2006)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ublic journalism on civil society from 1994 to 2002: Organizational factors, project features, story frames, and citizen engagement.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3(1): 77-100. doi: 10.1177/107769900608300106

- Nolan, D. (2008)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subjects.'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9(6): 733-749. doi: 10.1177/1464884908096243
- North, L. (2004) Naked women, feminism, and newsroom cul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2): 54-67.
- Rauch, J., Trager, K., and Kim, E. (2003) Clinging to tradition, welcoming civic solutions: A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iv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8(2): 175-186. doi: 10.1177/107769580305800206
- Rhodes, J. (2001) Journ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 What's a feminist to d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1): 49-53. doi: 10.1080/14680770120042837
- Robinson, G. J. (2008) Feminist approaches to journalism studies: Canadian perspectives. *Global Media Journal, Canadian Edition*, 1(1): 123-136.
- Ross, K. (2001) Women at work: Journalism as en-gendered practice. *Journalism Studies*, 2(4): 531-544. doi: 10.1080/14616700120086404
- Ross, K. (2007) The journalist, the housewife, the citizen and the press: Women and men as sources in local news narratives.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8(4): 449-473. doi: 10.1177/1464884907078659
- Schudson, M. (1999) 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the public. In T.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118-13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Thomas, J. (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Sage. doi: 10.4135/9781412983945
- Wade, L. (2011) The emancipatory promise of the habitus: Lindy hop, the body, and social change. *Ethnography*, 12(2): 224-246. doi:

10.1177/1466138111398231

Woodstock, L. (2002) Public journalism's talk cure.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3(1): 37-55.

Gender Politics in a Non-Mainstream Newsroom: A Case Study of the Shih-Hsin University Publication *Newsweek*

Yu-Ling Li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L. McNa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gendered habitus and its location of activity. It examines the gender politics in the newsroom of Shih-Hsin University's *Newsweek*, which is a non-mainstream and community-oriented local publication, and explores how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public journalism influences the gendered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of journalism students.

The study has produced four findings. First, female reporters in the female-dominated newsroom do not feel that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re negative capital, 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tend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o lead to some conflicts and controversies.

Secondly, the majority of the newsroom participants are female, and they tend to choose journalistic roles based on relations with classmates and friends, and thus to reinforce the impact of peer relationships on their news practices.

Thirdly, the newsroom holds ideals of dedication to the public benefit, 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follows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norms. Students

tend to accept the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norms in order to get their articles published.

Finally, if a student's gendered habitus does not meet th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required by the news section, she/he would likely experience more frustr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the internship process.

Key words: public journalism, gender and journalism, gendered habitus,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journalism, journalistic field

◎作者簡介

林宇玲，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主要教授課程：新聞理論、媒體與性別、公共新聞學、閱聽人研究、傳播與文化、媒體識讀等。

〈聯絡方式〉

Email: ylin@mail.shu.edu.tw